

民主：危机与新生

[英] 保罗·金斯伯格 / 著
张力 / 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公共思想译丛



Democracy: Crisis and Renewal

民主：危机与新生

[英] 保罗·金斯伯格 / 著
张力 / 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主：危机与新生 / (英) 金斯伯格著；张力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4
(公共思想译丛)

ISBN 978 - 7 - 5093 - 3610 - 6

I. ①民… II. ①金… ②张… III. ①民主 - 研究 -
欧洲 IV. ①D7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6948 号

策划编辑 周林刚

封面设计 李 宁

民主：危机与新生

MINZHU: WEIJI YU XINSHENG

著者/ (英) 保罗·金斯伯格

译者/张 力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640 × 960 毫米 16

版次/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张/9 字数/117 千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 - 7 - 5093 - 3610 - 6

定价：29.00 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传真：66031119

网址：<http://www.zgfzs.com>

编辑部电话：66067024

市场营销部电话：66017726

邮购部电话：66033288

目 录

序幕：心灵际会	1
第一部分	15
1. 悖论之一：直接民主与共产主义专政	17
2. 悖论之二：自由民主的胜利与危机产生的共时性	24
3. 欧盟的民主赤字	33
第二部分	39
1. 十字路口上的民主	41
2. 积极和具有批判精神的公民	44
3. 从原子式的家庭到“连带系统”	47
4. 市民社会的挑战	50
5. 审议式民主	58
6. 地方政府与民主的新生	63
第三部分	77
1. 经济民主	79
2. 民主与性别	93
3. 时间和规模	104
4. 回到欧盟	116
尾声：2008 年的春天，马克思和密尔，在天堂	120
参考书目	126

序幕：心灵际会

我要讲述的故事始于伦敦，始于 1873 年一个春天的晚上。这是一个充满湿气、但并非特别寒冷的夜晚，城市被笼罩在一片湿雾之中。作为大英帝国的首相，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 行将卸任，这是他在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漫长统治期间的首个且是最为值得铭记的任期。在下议院，他的《爱尔兰大学法案》（Irish University Bill）刚刚遭受挫败。而在远离首都的千里之外，身为阿散蒂（Ashanti）的勇士和君主，科菲·加里—加里（Kofi kari - kari，英国媒体称之为“咖啡国王”）正危及黄金海岸的英国移民及其利益。

两位年过半百之人——一位 54 岁，另一位 66 岁——首次相见了，其中，年长者邀请年岁较轻者到他位于维多利亚大街阿尔伯特公寓的家中共进晚餐。他们都有人陪同，一位由他的女儿埃莉诺（Eleanor）相随，另一位则由其继女海伦（Helen）陪护。较年轻的那位看起来衣着邋遢，留着一脸浓密和不甚干净的灰白胡须，并正遭受痼疾和支气管炎病痛的困扰。他的英语发音短促精炼，显然是受其德语口音的影响；事实上，他是一名德国人。

* 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自由党政治家，他曾四次出任英国首相，分别是在 1868 - 1874 年、1880 - 1885 年、1886 年、1892 - 1894 年。在其第一个任期内，他试图在都柏林建立联合多个学院的大学，但他提出的《爱尔兰大学法案》却在下院被否决了，直到 1879 年迪斯雷利（Disraeli）担任首相期间，与之相关的法案才获通过。——译者注

另一位则是纯正的英国人，尽管出于对健康的考虑，同时也出于靠近爱妻哈丽特·泰勒（Harriet Taylor）之墓的原因，他曾在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他的妻子在1858年11月逝世于此——居住过多年，那里气候温暖，有助于其健康。那位英国人举止得体、彬彬有礼，而那位德国人则显得性情急躁、没什么耐心。如果说其中一位像以理智行事的格雷伊猎犬，那另一位便是公牛。除了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他们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心灵。

会面伊始，由于两个人在性格和信念方面的鲜明反差，交谈气氛十分尴尬，甚至显得磕磕绊绊。但气氛很快便热络起来，他们所共有的对事物的好奇心占据了上风。年长者，即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是其时代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可能在任何时代也是最重要的），他对社会主义——若非共产主义——的兴趣与日俱增。在1848年，密尔对发生在巴黎的革命表示欢迎，法国在他眼里向来是和社会和政治实验的先锋，他希望法国人能在保留私有财产制度的同时，也能支持“通过合作摒弃私有制的一切具可能性的实验”。^[1] 密尔总是更愿意回到保留私有制的首要原则，这正如他在遗著《论社会主义》（*Chapters on Socialism*）中所表达的，他对“革命派”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持怀疑态度的。^[2] 不过，在1870年7月，他依然对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就普法战争爆发所发表的宣言表示认同。该宣言是由我们故事的第二位主人公起草写就，猜中他是谁并不会得到什么奖励。在他代表第一国际所作的声明中，卡尔·马克思强调，法国和德国的工

[1] J. S. Mill to Henry Samuel Chapman, 28 May, 1849, in Mill, *Collected Works* (以下简称 MCX), Toronto/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vol. 14 (1972), p. 33.

[2] J. S. Mill, *Chapters on Socialism* (1879), in *MCW*, vol. 5 (1967), pp. 702–53.

人阶级需要联合起来，而非相互厮杀。密尔对此深表赞同。^[3]

密尔和马克思两人尽管在生活环境和对待事物的感性程度上存在差异，但是，他们均是英国政治圈内的活跃者。从1865年到1868年，密尔曾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国家议会担任自由党议员。他曾经为1867年议会改革法案提交过一份重要的修正案，主张用“每个人”（person）取代“男人”（man）一词，意在使与男性选民具备同等资质的女性获得选举权。该修正案得到了73名议员的支持，其中便包括迪斯雷利（Disraeli）*。1866年，在格莱斯顿的选举权改革法案被议会否决之后，密尔出力帮助避免了来自工人阶级的示威者与军队之间发生冲突。虽然他认同工人们示威的缘由，但他仍然说服了工人领袖们放弃在海德公园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念头：“我相信没有其他人，”他在事件结束后自豪地写道，“除了联系不上的格莱斯顿先生和布莱特先生（Mr Bright），** 在那个时刻拥有约束安抚工人阶级的必要影响力。”^[4]至于马克思，他一直与英国的手工业工人们还有工团主义者一道，耐心并且执着地为第一国际工人协会（1864—1876年）搭建

[3] David McLella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thought*, London, Macmillan, 1973, p. 390. For Mills last years, Nicholas Capaldi, *John Stuart Mill: A B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32—65; Michael St John Packe, *The Life of John Stuart Mill*,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54, pp. 473—503. 对马克思心理最为细腻的研究来自 Jerrold Seigel, *Marx's Fate: The Shape of a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作为短述，以赛亚·伯林撰写的马克思传记至今仍无人能出其右：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1st edn 1939), esp. PP. 220—84 for the last years in London.

* 迪斯雷利（Disraeli）：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保守党政治家，曾在1868年和1874—1880年期间两次担任首相。——译者注

** 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英国激进自由派政治家，1843—1889年间曾任英国下议院议员。——译者注

[4] J. S. Mill, *Autobiography* (1873), in *MCW*, vol. 1 (1981), p. 279. 亦可参见 C. L. Ten, “Democracy, Social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in John Skorupski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i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72—4, and Capaldi, *John Stuart Mill*, p. 327.

初期的完整架构。^{〔5〕}

在1873年3月那个晚上的漫长交谈过程中，密尔和马克思两人谈到了许多问题，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共识也显现无遗。密尔家的餐桌上照惯例以清淡为主，马克思对此并未获得共同的享受。根据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叙说，马克思有个嗜好，即喜好“重口味的食物，如火腿、熏鱼、鱼子酱和腌菜，剧烈的脑力劳动使他牺牲了食欲”。^{〔6〕}

和马克思交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马克思的孩子们曾和他玩过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室内游戏，这个游戏叫做“自白”。她们向马克思提问，要其回答偏好之事：您最喜欢的颜色？“红色”。您最喜欢的食物？“鱼”。您对幸福的理解？“斗争”。您对不幸的理解？“屈从”。^{〔7〕}

在阿尔伯特公寓的晚宴中，马克思占据了多数谈话时间，他从他最喜欢的作家——莎士比亚、但丁、埃斯库罗斯、彭斯（Burns）* 那里旁征博引，发表评论。他是散文和诗歌的热忱读者。密尔则在一旁倾听和微笑。虽然绝非被马克思的滔滔不绝所镇住，但两位女士，埃莉诺·马克思和海伦·泰勒几乎都没说过什么话。马克思常喜欢说“孩子们一定要教导其父母”，他和自己的三个女儿之间关系十分融洽。密尔则喜欢把泰勒——首先是指他的妻子，但也包括其女儿——放在令人敬畏的完人位置上加

〔5〕 David Fernbach, “Introduction”, in Karl Marx, *Political Writings*, vol. 3,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ed. David Fernbach,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pp. 9 – 71; J. Braunthal,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vol. 1, 1864 – 1914, London, Nelson, 1966.

〔6〕 Paul Lafargue, “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Karl Marx”, in D. Ryazanoff (ed.), *Karl Marx: Man, thinker and Revolutionist*, London, Martin Lawrence, 1927, p. 187.

〔7〕 Francis Wheen, *Karl Marx*, London, Fourth Estate, 1999, pp. 387 – 8. 恩格斯的答案则无足轻重，在他看来，幸福就是品尝1848年产的玛格斯红葡萄酒，而不幸则是“不得不去看牙医”；Seigel, *Marx's Fate*, p. 265.

* 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 – 1796）：苏格兰著名诗人，其诗作以歌颂乡村和大自然为特色，也被称作“农夫诗人”。——译者注

以崇拜，同时贬低自己。这是马克思做梦也不会做的事情。在自传中，密尔写道：

想必过去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如此幸运，在遭受如我所受的损失（爱妻哈丽特去世）后，仍得到另一次中彩般的奖赏——即拥有最珍贵品质的另一位陪伴者、激励者、建议者与指导者（哈丽特的女儿海伦）。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任何一个想起我以及我所做成就的人，都一定不能忘记这些成就绝非单独一个人的智力和良心成果，而是三个人的成果。其中，尽管成果上署的是我的名字，但它却是最不值得注意，尤其是最不具有原创性的一个。^{〔8〕}

密尔和马克思之间存在巨大分歧的一个领域乃是经济领域，不过，这或许并非我们可能马上设想的那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好处和进步力量是坚信不疑的。要了解这点，阅读一下《共产党宣言》中那个脍炙人口的段落便足够了。在那里，他对资产阶级所取得的非凡经济成就赞誉有加，在短短一百年间，资产阶级的成就已经使得“人类征服了自然力”，并且“创造了远远超过埃及金字塔、罗马高架水渠以及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在马克思看来，现代资产阶级所创造出来的大规模生产力比之前所有时代加起来的还要多。^{〔9〕} 人类是“自然的主人”，而“自然将按人类的意愿行事”。^{〔10〕} 正是基于这一理由，他相信，世界历史

〔8〕 Mill, *Autobiography*, pp. 264–5.

〔9〕 Karl Marx,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arx, *Political Writings*, vol. 1,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ed. David Fernbach,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 72.

〔10〕 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London, Martin Lawrence, 1933, p. 21.

中的一个崭新、终极的阶段，即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已被提上议事日程，其经济和科学基础已经奠定。

密尔则显得更为谨慎，或者说是更为现代。他力图向马克思解释，无尽的增长乃是实实在在的危险。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必要建立经济发展的“稳态平衡”，以限制不必要的增长。对此，密尔明白无误地列举了三个理由：避免过度的城市化和人群密集度；防止伴随着“每一丛灌木或每一棵多余的树木被连根拔起”，自然被彻头彻尾地开发利用；以及避免对物质繁荣的过分看重。^[11]

在1836年，当人们热烈讨论拟议中的到布莱顿（Brighton）的新铁路线路时，密尔发现没人想到要保护甚为美丽的自然景区，如博克斯山（Box Hill）脚下的诺伯里山谷（Vale of Norbury），他为此感到惋惜。而就伦敦的生活来说，他讨厌他称之为“推推搡搡、摩肩接踵”的现代生活。^[12] 密尔厌恶“一门心思的逐利者”，在这一点上，他和马克思相去不远。

正如保罗·斯马特（Paul Smart）所指出的那样，虽然来自相当不同的传统——一个是理想主义，另一个是实用主义——但是，马克思和密尔两人却拥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即，在人类能力当中潜藏着追求更美好事物，并更积极、主动地介入生存境况的天性。^[13] 尽管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第一卷的脚注中接二连三地对密尔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予以直率的批评，但他仍然视密尔为

[11] Alan Ryan, *J. S. Mill*,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4, pp. 181–2. 密尔对环境的有关论述，参见 Donald Winch, “Thinking Green, Nineteenth-century Style: John Stuart Mill and John Ruskin”, in Mark Bevir and Frank Trentmann (eds.), *Markets in Historical Contex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05–28.

[12] J. 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52), in *MCW*, vol. 3 (1965), P. 754.

[13] Paul Smart, *Mill and Marx: Individual Liberty and the Roads to Freedo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63.

值得尊敬的对手。他注意到，密尔在其 1852 年版本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插入新的一节，以强调工人合作的重要性。而在 1871 年 7 月，马克思则曾对一名美国记者表示：“他（密尔）已经发现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则希望向世人展示，有可能在两者之间建立另外一种关系。”^[14]

然而在这里，正是在他们讨论中有关民主的那个部分引发了我的兴趣。我认为，密尔和马克思两人既可以说都是民主主义者，但也可以说同时都不是民主主义者，这么说并无偏颇，尽管对此仍将自然而然地存在很大争议。密尔信奉代议制民主，并在 1861 年出版了一本颇具篇幅的著作，即《代议制政府》。在该书的第三章结尾，他写道：“容许所有人均等享有国家主权，终究没有比这更低的诉求了。但是，在一个规模远超小城镇的共同体当中，由于所有人只能亲自参与一些相当少数的公共事务，结论便是，一个完美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15]此外，如我们所见，密尔希望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所有人在代议制民主之下，皆有权投票。

话虽如此，但密尔同样真切地感受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整个工人阶级都尚未为民主做好准备，他们所受的教育还不充足，对这部分讨论恰是他的民主理论的缺憾之处。他害怕出现充斥着无知和偏见的多数人暴政，同时，起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密尔坚持不同权重的选举制度，即所谓的复数投票制，它能确保有教养的阶级可以获得更多的代表权重。更有甚者，密尔还

[14] Marx,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p. 399. R. Landor 对马克思的采访刊载于 1871 年 7 月 18 日的 *New York Journal World*。密尔在修订后的“论劳工阶级的未来可能性”一章中纳入对 1848 - 1851 年间法国合作社的思考，他认为合作社已“广泛播撒了未来进步的种子”；*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p. 758 - 96.

[15] J. S. Mill,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1861), in *MCW*, vol. 19 (1977), p. 412.

确信，“引领公共事务的实际导向”这一重任应当委托给一个非选举的精英阶层：“即一小群德高望重者；他们经验丰富，其所受教育和经历使其恰如其分地做好准备，并对这个国家独力承担责任。”^[16]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他信奉的是直接或参与民主，这种类型的民主建立在给定国家的全体公民积极参与的基础之上。马克思视代议制民主为一场骗局，在《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一文中，他将其描述为“政治状态的诡辩”；他认为，在代议制民主中，所有人在政治上看似自由和平等，但实际上却被收入和权力的不平等深深地分作三六九等。惟有有效地消除政治国家中的人与市民社会中的人两者之间的深重隔阂，弥合抽象意义上的人与现实中的人（马克思称之为“*der wahre Mensch*”，即“真正的人”）之间的深刻裂纹，方能实现人类的解放。^[17]马克思对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之间的必要联系花费了许多笔墨和心血，这是我在后文应予以关注的。

在1871年，即马克思和密尔在伦敦会面的两年之前，短暂而激进的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作为普法战争的后果之一，起义淹没了法国首都巴黎的大街小巷。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起义是崭新且更为先进政治组织制度的萌芽。他在《法兰西内战》这本小册子中写道，公社终于“为共和国提供了真实民主制度的基础”，

[16] 同上，pp. 433 - 4. 亦可参见 J. H. Burns, “J. S. Mill and Democracy, 1829 - 61”, *Political Studies*, vol. 5 (1957), no. 2, pp. 158 - 75 and no. 3, pp. 281 - 94. 他总结道 (pp. 293 - 4): “依密尔的这些标准，民主终究还是没落了，这是因为它所依托的假定与密尔过去三十年所确信和谆谆教诲的观念相抵牾——根据这一假定，权力的运作要求所有人在道德和智力品质上是平等的。”

[17] Karl Marx, “On the Jewish Question” (1843), in Marx, *Early Writings*, ed. Lucio Colletti,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5, pp. 220 - 21.

“人们最终发现，它是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18〕}权力将被分散，人民民兵将取代常备军，公民们将积极参与到决策过程中，代表们（delegates）（不是议员们）所拿的工资水平将和工人持平，并同时服从选民们的召唤。在密尔眼中，参与民主仅适用于小城镇，不过马克思的想法显然与此不同，在他看来，巴黎公社证明了自身在大规模现代国家中的可行性，而且，巴黎模式可在联邦形态下的法国被广泛复制。虽然在巴黎公社中，经济民主尚未得到实现，但是政治领域的实践已经接近这么一个目标，即全体人民的共同需求和共同控制。

然而，可以说如密尔的理论一样，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同样具有阴暗面，他不单单只设想了上面这么一种民主模式，而是设想了两种未来可能的民主模式。“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术语在马克思与他人的通信中如恶兆般出没，但他从未对其系统性地加以发展。他对“无产阶级专政”观念的执着信念无疑预示着对民主措辞的损害。^{〔19〕}同样地，在他的著述中，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暗示，他所提出的两种模式——无产阶级专政和巴黎公社——具有历时性的联系；他也并未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普遍的、去集权的参与民主到来之前所必经的临时性序幕。与巴黎公社相比，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种完全不同，而且与之反差强烈的政治组织模式，它比前者更为集权、更具排斥性、更为专制。由于马克思从未系统地研究过民主问题（他曾雄心勃勃地将民主问题列入研究和写作计划，但或许起码得活到100岁才能有时间来完成此事），人们也无从清楚地得知他更偏好哪种模式，或者如果两者真的可

〔18〕 Karl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in Marx,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p. 212.

〔19〕 最著名的佐证是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 Joseph Weydemeyer 的信件；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9,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3, pp. 62–3. 亦可参见 K.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p. 44.

以在时间阶段上联系在一起的话，它们该如何联系在一起。

至少根据我们时代的标准，若非他们时代的话，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密尔，两人都难以被称作完美无瑕的民主主义者。值得强调的是，他们拥有同样一个倾向，即将特权性的政治地位和领导作用归于单独一个阶级，明显不同的只是他们心仪的阶级有别——密尔偏好开明的资产阶级，而马克思选择了工业无产阶级。在所有民族和国家都是民主制度的平等候选对象这个意义上，他们也都不是普遍主义者。基于其在印度公务系统的长期经验，密尔会毫不迟疑地谴责“欧洲殖民者”所拥有的过度权力，后者“视印度人民不过是他们脚下的污泥”，但是，他对优等国家，即英国的文明使命也持毫不怀疑的态度。^[20]至于马克思，虽然他号召全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但在他的观察中，他的论断极其严格地仅仅适用于某些特定国家，苏俄的斯拉夫人只是例外。

* * * * *

在伦敦会谈的那个夜晚，几杯波尔图葡萄酒下肚，马克思对密尔有关民主的若干重要观点进行了攻击。他实在不能接受密尔将目不识丁者排除出选举人范围的观点，也不能接受后者对复数投票权的坚持。此外，让马克思感到奇怪的是，虽然密尔早在1848年就对当年那场革命以及其中的社会主义要素表示欢迎，但他却从来没有驻足去深思1871年巴黎公社的民主意义。

密尔以标准的自由主义方式对此作出了耐心回应。他承认自己对巴黎公社未曾给予充分关注。但是，他提醒马克思，在1872年10月，当他仍在阿维尼翁时，便已对托马斯·斯密斯（Thom-

[20] Mill,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p. 571.

as Smith) 的来信给予了详尽回复, 后者是国际工人协会 (即第一国际) 诺丁汉分会的书记。斯密斯寄给密尔一本他自己的小册子, 小册子名为《公社信札——革命法则; 或人类社会的逻辑发展》。在回信中, 密尔写道: “对于协会的活动原则, 有许多我是热切认同的, 几乎没有什么原则是我坚决反对的, 除非硬要我挑选。” 不过, 他确实反对象革命概念的法国式过度使用: “被用于任何原则或观点的‘革命’一词绝非英语上的表达。” 他所寄予厚爱的法国人民已经误入歧途, 使他们误入歧途的正是这么一种想法, 即“误将抽象事物当作拥有意志力并能产生能力力量的实际之物”。^[21]

六个月之后, 在伦敦的这顿晚餐中, 密尔同意马克思说的, 巴黎公社拥护者们所提出的联邦政府体制很可能是最好的出路。但是, 他再次重申革命过程中的种种危险, 并提醒马克思, 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两者之间存在着天差地别。“工人阶级,” 密尔说道, “或任何代表工人阶级的人” 将会塑造集中式的经济制度, 消灭所有的反对意见, 并且表现出一种“对他人苦难的漠不关心, 即使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 (Saint-Just) 也无法做到这种漠不关心”。不过紧接着, 为了有所缓和, 使自己的观点更能被马克思接受, 密尔赞同后者在六个月前, 即 1872 年 9 月 8 日在阿姆斯特丹对一群工人阶级听众的演讲, 马克思在演讲中主张: “我们不否认, 在某些国家, 如美国、英国, 以及如果我对你们的国情更为了解的话, 我会再加上荷兰, 工人阶级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他们的目标。”^[22] 对密尔而言, 这是一条他和马克思可以

[21] J. S. Mill to Thomas Smith, 4 October 1872, in *MCW*, vol. 17 (1972) . pp. 1910 ~ 12.

[22] “The Hague Congress. Reporter’s record of the speech made by K. Marx at the meeting held in Amsterdam on September 8, 1872”, in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Selected Works* (2 vo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2, vol. 2, p. 293.

携手并肩前进的金光大道。

当马克思和埃莉诺离开密尔家时，时间已临近午夜。在陪马克思走到门口时，密尔引用了几行诗当作他们共同的慰藉——他们都是正在老去的思考者，但仍然渴望讨论和学习——这几行诗出自他最喜欢的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序曲》（The Two-Part Prelude）：

少年时

不乏开心的时刻，但是，当每时

每刻都能体味知识的收获，

当所有的知识都令人欢愉，这是

何等的幸福——全无丝毫的忧愁！^[23]

密尔将在这次会面后不到一个月辞世。他和海伦回到了法国，并和植物学家朋友让·亨利·法布尔（Jean Henri Fabre）在奥兰治郊外乡间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植物考察，这次考察之后，密尔染病不起。而既无时间、也无机会对植物学产生兴趣的马克思则比密尔多在世上逗留了十年。

* * * * *

上文我向你们叙述的那个会面从未发生过，我必须向研究马克思和密尔的专家们表示歉意，因为我的虚构显得冒昧，并给他们带来了些许不适。尽管如此，我归之于他们的每一句话和每一

[23] William Wordsworth, “The Two - Part Prelude”, in Wordsworth, *Selected Poetry*, ed. Nicholas Ro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2, p. 120.（译文采自威廉·华兹华斯：《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丁宏为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41页。——译者注）

个立场都准确反映了他们真实的态度。密尔确实赞同马克思在 1870 年就普法战争发表的声明；马克思在 1872 年 9 月也确实说过，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掌握权力；密尔确实曾说过，联邦制是法国最好的出路；他最喜欢的诗人乃是威廉·华兹华斯；诸如此类等等。马克思和密尔的会面是可能发生的，尽管实际上它没有发生。密尔在阿尔伯特公寓家中的最后一个三月份充满了忙碌的社会活动，总有拜访者在 7 点受邀前来共进晚餐。至于马克思，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也拥有大量的社会活动，甚至接受另一位自由党议会议员、绝非无产阶级的芒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格兰特·达夫爵士（Sir Mountstuart Elphinstone Grant-Duff）的邀请，去一个绅士俱乐部参加晚宴。

我虚拟这样的会面是为了引出本书的主题：现代民主的性质和可能性。1873 年的马克思和密尔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如选民的范围、不同社会阶级的政治角色、经济民主的性质。但是，他们的观点同样有许多相通之处——如密尔所说的“所有人均等享有国家主权”，男性和女性在政治和社会中皆有成为积极主体的需要，以及工人阶级通过和平方式行使政治权力。甚至时至今日，这些目标都没有实现。此外，一百年来，虽然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智识传统统治了 20 世纪的世界政治，我所虚拟的会面也隐约提出它们本应交汇，但是，它们却彻彻底底地分道扬镳了。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能够联合其军事力量，打败国际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恐怖威胁，然而，它们却无法更进一步。

1989 年，自由民主似乎取得了胜利。但是，就在其获得全球性胜利的那一刻，它的许多基本实践却被发现存在缺陷，许多自吹自擂被证明毫无根据。当下的自由民主是高度脆弱的。人们迫